

■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

中国古代作家的 文化心态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中国古代作家的 文化心态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周晓琳,刘玉平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4. 12
ISBN 7-80659-676-3

I. 中... II. ①周... ②刘... III. 文学创作—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1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173 号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676-3/I·22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研究成果。作者从客观生存环境与作家创作心态、主体生理、心理机制与作家创作心态两个基本方面展开研究，在主客体的整合中勾勒作家的灵魂，并展现其创作的独特风貌。

本书的基本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上编为宏观把握，着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思想、主流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对作家群体的人生实践及其创作心态的影响，重点探讨作家群体共有的文化心态。下编为个案分析，以史为线索，具体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代表作家的特殊心态，在把握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具体影响的基础上，联系主体的气质类型、性格特征等生理、心理机制以突出个体不同的特色。

本书的研究同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心理学两大类学科的相关知识，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作者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有机融合起来，建立起一个新的视点。研究过程中，坚持在角色环境与角色视点的统一中解读文学文本，

实现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的有机联系，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多层次性、矛盾性以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采用系统的、辩证的方法进行阐释。其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批评史对作家主体研究不足之缺陷，有助于更加系统深入地揭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活动的规律。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宏观把握

一 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作家创作心态.....	(12)
二 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伤体验.....	(36)
三 中国古代作家的功利心态.....	(56)
四 中国古代作家的游戏心态.....	(77)
五 中国古代作家的孤独心态.....	(100)
六 中国古代作家的“臣妾”心态.....	(114)
七 中国古代作家的山水审美心态.....	(136)
八 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守望”心态.....	(164)
九 明清艳情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心理解读.....	(185)

下编 个案分析

- 一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 屈原的“恋楚”情结…………… (203)
- 二 转蓬离根本，飘摇随长风
 - 曹植后期的“转蓬”心态解析…………… (222)
- 三 孤独者的哀音
 - 阮籍《咏怀诗》心理学解读…………… (236)
- 四 平淡出于自然
 - 陶渊明“自然”心态解析…………… (248)
- 五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泻处
 - 谢灵运山水诗心理学解读…………… (264)
- 六 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
 - 庾信后期诗赋的情感模式…………… (280)
- 七 从“动为苍生谋”到“端坐学无生”
 - 王维的心路历程、创作心态及其山水诗的禅境
…………… (295)
- 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 试论李白的“长安情结”…………… (314)
- 九 为公歌此曲，涕泪在衣巾
 - 杜甫愁苦心态的文化阐释…………… (326)
- 十 心肝未了人间春，庞眉尚作哦诗吟

——李贺诗歌创作心理定势分析·····	(348)
十一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超然心态·····	(360)
十二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秦观诗词创作中的“女郎”心态·····	(383)
十三 郎君领袖，浪子班头	
——关汉卿的“浪子”心态·····	(400)
十四 记梦·造梦	
——汤显祖创作心理解析·····	(415)
十五 旷世奇才的畸变心灵	
——徐渭的病态人格及其文学创作·····	(427)
十六 旧梦依然，新往吾安	
——钱谦益的贰臣心态·····	(445)
十七 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蒲松龄“孤愤”心态新探·····	(465)
十八 阳刚的失落	
——贾宝玉的女性化与曹雪芹的创作心理·····	(485)
主要参考书目 ·····	(501)
后 记 ·····	(503)

绪 论

就本质而言，文学创作是一种充溢着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因此，作家的文化心态构成了文学创作特殊的心理背景。研究作家的创作心态，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系统地认识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以及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规律。

一 关于文化心态的界定

心态，简言之，是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包括心境与态度两个方面。按照心理学的解释，心境是一种比较持久而微弱的情绪状态，具有弥散性的特点，往往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人的言行和情绪，使之带上特定的色彩。态度则是指人对于事物的看法，“是一种精神和神经准备就绪的状态，它通过经验组织起来，并对个人所面临的客观对象和与之有关的情境作出反应，产生一种起指

导作用或能动作用的影响”（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阿尔波特语）^①。如果说心境对人的当下活动及事物侧重于表现为一种先在的情感倾向的话，那么，态度则更多地表现为人对当下活动及事物的理性选择。二者有机互渗整合构成的主体心态，极大地影响着人的行为，预决着当下活动的目标指向。所谓人的能动性，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体现为心态对主体的这种影响。

文化心态，是指主体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受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心态。人并非单纯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命远非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所积淀的精神传统，将个体生命置于一个无可抗拒的文化“场”之中，对每一当下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潜在而且巨大的影响力，使之形成特定的心态，换言之，人的心态将注定会打上文化的烙印。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人的文化心态充满差异。从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种差异首先源于个体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以及置身的文化氛围的不同。不同民族的成员固然接受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熏陶，即使是同一民族的成员，也因为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流动性、开放性等特征，而不可能将其作为凝固的实体加以接受，故而他们的文化心态亦会因时代而异。“时代”所代表的决非抽象的时间概念，它以自己所指示的特定时间与特定的空间相联系，每一个时间坐标点上的空间都通过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包括生产水平、价值取向、政治制度、道德风貌、民俗民情等）显示着彼此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时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从

① 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而也铸就了他们不同的文化心态。汉代赋家欲包举宇内的雄心，魏晋士人洒脱不羁的风度，盛唐诗人的豪迈乐观，元代作家的崇尚虚无，……无不表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从中观的层面来看，作家所面临的具体生存环境和独特的人生遭际同样能够导致其文化心态的差异。每一个体作家都具有自身鲜活的感性生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培养起来的理性思辨能力，个体的生存状况（包括家庭环境、接受教育情况、人际关系、人生经历等）通过影响他们的生命感觉进而影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阐释和时代信息的选择接收，因此，同一民族、同一时代的作家完全可能因为个人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的不同而导致创作心态的差异，例如，同时出现于盛唐时期的高岑边塞诗人与王孟山水田园诗人，其文化心态所呈现出的显著差异就不仅仅是时代原因所致。再次，从微观方面来看，作家文化心态的形成还要受到自身生理、心理素质的影响，那些属于先天遗传的部分，因其是与生俱来的人类世代遗传的产物，具有解剖和生理学的基础，所以相对稳定性较强，而且体现出极强的个体差异。个体的体质、神经类型、生理生化 and 免疫系统的特征等因素，是其心理学因素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用的物质承受者，作家先天的气质类型以及后天的生理功能病变均会对他们的思维方式、情绪倾向、行为习惯、性格特征等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其创作心态表现出来，这一点在陶渊明的自然心态、秦观的“女郎”心态以及徐渭的狂狷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证实。

二 文化心态的特征

文化心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稳定性。文化心态作为主体心境与态度有机互渗的整合，具有稳定性特征。它一旦形成，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对于某些个体而言甚至会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归隐后的陶渊明，委运乘化，淡泊宁静，尽管不乏“猛志逸四海，骖翮思远翥”的豪情勃发抑或“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的孤独怆然，但在主导的意义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构成了陶渊明以“自然”为核心的稳定的文化心态，惟其如此，其田园诗创作才构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文化心态的稳定性决定于主体人生观、价值观的稳定性，在特定文化传统氛围中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主体经过长时期理性思考、甄别、选择的结果，决非一时冲动的产物，因此很难轻易改变。正是这一品格赋予了文化心态的稳定性特质。当然，稳定并非绝对的。如果主体置身于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期或者其个体生活发生重大变故，都可能导致文化心态的变化，但变化以后的具有新质的文化心态，又趋于新的稳定，曹植后期创作心态的变化与保持便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动力性。人既是受动的，也是主动的。在受动的意义上，文化心态是在个体生理基础之上受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在主动的意义上，既成的文化心态又构成了个体行为的驱动源。对作家而言，文化心态通常是其从事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任何作家的创作无不为其特有的文化心态所驱动。中国古代文论向有“感物”之说，即所谓“凡音之起，由人生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礼记·乐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强调客观生活对文学创作之第一性意义，这无疑是符合规律的。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感物”说还潜含着另一逻辑的判断，即“心”是由“物”至“文”不可或缺的中介，换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文”源于“物”，但在直接的意义上，“文”源于“心”。“物”之“感人”，并非同一特定之“物”能“感”所有人，也并非某一作家能为所有“物”感动。在这里，特定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思想、情感、态度等构成了主体特有的过滤器，既规定着作家对“物”的接受界域，也预决着作家“感物”的方向。“物”一旦通过这一过滤器，作家便“应物斯感”（刘勰语），构成创作的原初冲动。

第三，指向性。作为一种精神和神经准备就绪的状态，心态一旦形成，必然对主体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又由于这种情绪状态本身具有持久性，故它的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产生效应。对于个体作家而言，特殊的文化心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其创作的背景，一直会对他的审美注意、审美选择和审美表现发挥作用，使其创作具有一种相对专一的情感指向和审美指向，造成“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审美效果。王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其悠闲宁静、充满禅意的心态使他能够长期保持对自然山水细致的观察力，并用特殊的审美眼光去捕捉和欣赏那些时有时无、若隐若显、幽静飘渺的山水田园景色，从而创作出大量的具有空灵寂静、悠远朦胧意境

的山水诗佳作。安史之乱后，密切关注国计民生的杜甫被迫面对国破家散、民不聊生的苦难现实，其文化心态显示出“愁苦”的主要情感特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为创作心理定势使他后期的作品呈现着一种统一的精神风貌。

三 文化心态的构成

任何个体文化心态的形成都是一种“历时性”建构的结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永远是“现在时”而没有真正的“完成时”，除非生命已经终结，文化心态的稳定性不过是相对的“休止符”。但是，当我们对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进行总体理性观照，又可以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把握其基本结构。

我们认为，作家的文化心态是由三个不同层面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第一，生理的层面。文化心态无一例外地依附于个体生物机体组织，此乃基本常识。生理因素构成了文化心态的建构基础，同时又是既成文化心态的物质载体。

事实上，在心理学史上，不少学者均从器质——即人的自然生理条件方面研究个性的形成。如法国精神病学家克瑞奇米尔认为人的个性同体格有关，人的体征被认为是造成个性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体型、气质、行动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也认为每一气质类型都有相应的体型。另一些研究者则着眼于颅相，如法国解剖学家高尔即认为人的许多复杂的心理能力由许多特殊官能组成，而每种官能在大脑均有特定的

位置,某一官能的发展必然造成颅骨的隆起。因此,从颅骨的隆起即有可能对其主要个性特征作出分析。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则从大脑神经活动类型的研究入手,企图揭示个性心理形成的奥秘。凡此种种,其具体结论难免有片面甚或错误之处,但他们的思路却具有相当的价值——人首先是生物性意义上的个体,然后才是社会性、文化性意义上的个体,没有前者也就不可能成为后者。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文化心态,其物质基础和载体必然只能是个体的躯体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在 firsthand 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十分注意去了解和把握古代作家个体不同的生理条件以及先天因素在后天环境中的变化。

第二,心理的层面。心态作为心境和态度的有机整合,其构成离不开个体心理特质的参与。个体心理特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心态的建构。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文化环境,其文化心态却不尽相同乃至迥异,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个体心理特性不同。因此,心理特性可以认为是形成文化心态的中介。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巴甫洛夫的“思维类型”说,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等,都企图从“气质”的视角揭示心理特性之谜。他们的是非成败同样不是本书评价的范围,我们只想强调指出,气质不同的个体,通常具有不同的心理特性,在文化心态的构成中,它一方面给予生物学因素以深刻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又充当着中介的角色,通过自身实现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生物学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生物学因素基础上产生的个体心理特性,作为一种既成系统,感应、甄别、吸纳或拒斥着社会文化的影响,使之形成只属于自己的文化心态。

第三，文化的层面。文化心态的最终形成需要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社会文化因素是在个体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的共同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和制约心理学因素，是心理学因素赖以形成和出现的根源所在。

文化是人类劳动与智慧创造的产物，同时，作为个体的人又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文化的创造物，最终要以文化的角色显示自我的存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因素如物质生产水平、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感情、风俗习惯、民族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教育方式、性别差异等等均能够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心理产生明显而强烈的应激，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由于所接受的文化影响的不同，其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情绪倾向、动机系统、行为习惯、智慧特征、观念信仰必然会显示出差异。例如，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使个体所受到的经济上、精神上以至于生理上的压力大不一样，他们对于金钱、富贵的情感和态度也必然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作家有哭穷的创作传统，不少诗人常常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贫穷，如果我们对不同作家的哭穷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像孟郊那种贫寒之士的心酸悲叹，也不乏白居易晚年饱食终日后的闲适低吟，同时还有穷愁潦倒的元代散曲作家无路可走时的愤怒呐喊。又如，不同性别的个体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社会角色定位完全不同，他们对待同一事物的情感 and 态度也因之显示出差异。尽管离别同样给古代男女作家带来人生的巨大痛苦，但是面对离别，男性作家除了痛苦之外，还表现出潇洒与义无反顾，因为离别有可能成为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而女性作家则有更多的无奈与伤心，因为离去的丈夫带走了人生的